

# 苏联历史的沉思

张宏儒 主编



苏联历史的沉思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 苏联历史的沉思

张宏儒 主编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北京

**苏联历史的沉思**

Sulian Lieshi De Chensi

张宏儒 主编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永乐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47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65000—70000

ISBN7—5638—0091—3/D·8

定价：3.95元

## 前 言

列宁逝世后的首次联共（布）党代表大会是如何召开的？这次会议与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有什么关系？1937年至1939年为什么大批红军高级将领被清洗？红军百分之十以上高级将领被清洗带来了怎样严重的后果？1937年苏联人口究竟有多少？为什么那次人口普查的数字一直未予公布？1937年至1938年期间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命运如何？李森科这位在斯大林时期被誉为苏联生物学界泰斗的名流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誉满文坛的《青年近卫军》作家、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要负责人的法捷耶夫为什么会在1956年自杀身亡？一度蓬勃发展的苏联遗传学何以在后来被打入冷宫？……苏联历史上的这一个个谜团，多年来令人们费解，感到迷惑。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苏联人民正在深刻地反思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史，以汲取教训。1986年以来，苏联一些报刊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披露三四十年代大清洗的内幕。近年，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又为布哈林等大清洗的牺牲者平反昭雪。这段历史究竟告诉人们什么？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本书所收的15篇文章就是从苏联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选择的。作者或以翔实的资料揭示了自1924年列宁逝世至1956年苏共的十大这一历史时期在苏联发生的、曾引起轰动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及其被隐瞒的原因；或以痛苦的追忆，叙述了某些苏联

名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沉浮荣辱；或以深沉的反思探究斯大林当政时期的某些冤假错案。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看到那鲜为人知的历史帷幕的一角。

本书是我们编辑的大清洗内幕的第一部，书中所收文章大多是首次译成中文发表。我们准备继续选择苏联报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编辑出版，使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这段苏联历史。

本书责任编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联历史专家于沛。

张宏儒

1988年9月

## 目 录

前言	张宏儒 ( 1 )
第一次没有列宁	阿·伊·米高扬 ( 1 )
费多尔·拉斯科利尼科夫	瓦西里·波利加尔波夫 ( 17 )
反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阴谋	保罗·卡雷尔 ( 39 )
不要否认自己	阿纳多利·哥罗夫科夫 ( 52 )
《真理报》特派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命运之谜	
鲍里斯·叶菲莫夫	( 70 )
应该“往事重提”吗	鲍里斯·叶菲莫夫 ( 92 )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夫人的一段劳改营经历	
列夫·拉兹贡	( 119 )
一位科学家的经历	安娜·里瓦诺娃 ( 121 )
那时候我们到底有多少	马尔克·多利兹 ( 132 )
纪念尼·伊·瓦维洛夫诞辰100周年	
谢尔盖·佳琴科	( 139 )
三封信	阿列克谢伊·阿朱别伊 ( 153 )
苦涩的果实	B·索伊费尔 ( 156 )
昙花一现	达尼尔·格拉宁 ( 216 )
英雄之死——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生活片断	伊万·茹柯夫 ( 233 )
一个剧院之厄运	K·鲁德尼茨基 ( 274 )

## 第一次没有列宁

阿·伊·米高扬\*

### 代表大会前夕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开幕前三天，由边疆区党代表会议推选的北高加索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我和伏罗希洛夫——他当时是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官——动身早些，因为我们是中央委员，还要赶去参加代表大会前举行的中央全会。在我和伏罗希洛夫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日子里，我把即将生第二个孩子的妻子送到基斯洛沃次克去了。1924年6月，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为了纪念五个月前逝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们给儿子取名叫沃洛嘉。<sup>①</sup>

我们坐的是梯弗里斯至莫斯科的快车，同行的有奥尔忠尼启

---

\* 阿那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191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0年起任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1926—1946年历任苏联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供应人民委员、食品工业人民委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等职，1937年起兼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1966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5—1974年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23—1976年为苏共中央委员，1926年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1966年为政治局委员。

本文是他所写的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发表在苏联《星火》杂志1987年第50期。

——译注

①1941年，他17岁时作为志愿人员参加飞行学校，1942年9月在斯大林格勒一次空战中牺牲。——原注

则、基洛夫、奥拉赫拉什维利和米亚斯尼科扬（我们是在罗斯托夫会合的）。路上许多话题自然都是即将举行的全会和代表大会，党内形势以及国内总的情况。我们几个人很早就要好，我本人的许多经历都跟外高加索有关。

1923和1924两年的突出特点是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外交和发展外贸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由于接连两年丰收，不仅解决了国内粮食危机，而且明显地增加了粮食出口。我国的整个贸易第一次出现了出超。这使我们额外获得一笔可观的外汇。它一方面为一旦发生经济困难或天灾提供了某些保障，另一方面使我们得以拨出大约5000万卢布，超计划地为轻工企业在国外购买了我们紧缺的原料（棉花、皮革、橡胶）。由于有了原料，这些企业开始满负荷工作，农村急需的日用品生产也走上正轨。这一切都是为抵制托洛茨基反对派而进行的——他们主张实行所谓“商品外来干涉”政策，也就是说，要广泛地从国外进口日用工业制成品。

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件是中央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大量吸收工人入党。由于开展这一活动，一批优秀的、最坚定、最忠实、最正直和最勇敢的无产阶级子弟入了党。

劳动农民中间也出现了高涨的政治积极性。这一点，在北高加索（我在那里任边疆区委书记）也和全国其它许多农业地区一样，感到特别突出。

考虑到许多农民——贫农和中农想成为共产党员的巨大愿望，党中央在十三次党代会前不久，即1924年4月做出决定，吸收2万名最先进的农民入党，以便全面加强党和农村，特别是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

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大会日程上各项报告的提纲都公布了，数万名共产党员在地方党代表会议上广泛地讨论了提交党代会审议的各项问题，以具体的提案武装了自己的代表。



## 领袖的信

我们很理解自己对开好这次党代表大会所负有的巨大责任：它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如果说在上一次，即列宁因病没有出席的十二次党代会上，尽管无法当面聆听，毕竟还能遵照他的直接指示办事的话，那么这一次要我们自己解决问题了。而且要努力做到就象他还活着跟我们一道开会一样。

在1924年5月21日召开的全会上，受政治局委托发言的加米涅夫说，3天前（5月18日）克鲁普斯卡娅遵照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转给了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列宁遗嘱》的那封信。

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聆听列宁的信。这封信对于党的命运、对于维护其统一的必要性充满了最大的关怀。我们知道，列宁一向认为维护这种统一的保障之一是党的集体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一致。列宁当时对于这一切的担心，也感染了我们，全会的参加者。他对于中央委员会内部形成的局面不放心，特地对其个别成员做了评价，并且就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和疑虑，对于如何维护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稳定，如何保护它不被分裂，提出了政治建议。

由于托洛茨基特有的“非布尔什维主义”和醉心于发号施令，列宁实质上对他表示了不信任，但同时也就党的其他几位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缺点向党做了提醒，并且对他们每个人做了客观的、异常准确的评价。

谈到斯大林时，列宁强调说，斯大林成为党中央总书记①

① 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根据中央全会1922年4月3日的决定设立的。当时全会选举斯大林担任这个职务。应该交代的是，当年这个职位还没有后来它所获得的意义。总地说，书记处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只是政治局属下一个料理日常工作的执行机构——原注。

后，“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他能不能永远以足够的谨慎运用这个权力，我没有把握”。所以列宁建议“考虑一个把斯大林调离这个位置的方法，并且把另外一个人任命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须比斯大林同志多一个长处，那就是：更耐心，更忠实，更有礼貌和对同志更关心，少一些任性，等等”。

宣读了这封信后，加米涅夫告诉大家，政治局考虑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建议把这份列宁的文件通报给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但是政治局建议不在全体会议上，而是分代表团进行宣读和讨论。这个“细节”本身就已经具有一定的意思了。加米涅夫还补充说，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时从可以让斯大林留任总书记出发，因为他承认自己的性格中确有列宁指出的那些，并且担保认真对待。

我想，政治局这个建议反映了它内部的矛盾，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担心托洛茨基的作用得到加强。这个建议也包含着逃避执行列宁遗嘱的倾向。

政治局的建议在全会上没有讨论，因为没有人发表别的意见。全会通过了政治局关于向大会代表介绍列宁的信的程序的建议，并且决定不予公布，因为它只是给大会代表的。

## 大会的决定

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在每个代表团里都宣读和讨论了。各代表团都赞同斯大林留在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

我们这些大会代表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同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刚刚进行的一场尖锐斗争，大家都亲眼所见，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在我们应该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上，他机敏地、理由充分地捍卫了列宁的观点。

我们这些大会代表还不能不考虑的是，在中央全会上没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反对斯大林作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尽管他们中间有在列宁逝世后觊觎党的“首要角色”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有布哈林、李可夫这样的权威人物。

每逢回顾过去，我就想：那时，他们不听列宁的警告，一部分人没把斯大林看成厉害的对手，另一部分人则不认为他想当拿破仑式的领袖。因此，他们宁愿保留斯大林，而不想从比他更有权威，在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更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中间选拔什么人。他们担心那样一位领袖会比斯大林更厉害地强加于人，使集体领导蒙受损失。今天看来，这简直是咄咄怪事，甚至无法理解，然而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还注意到，《列宁遗嘱》对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都提了批评意见；另外，并没有提出替换斯大林的具体人选。假如列宁提了具体人选，那么政治局，更不要说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不会违背列宁的建议的。此外，不消说，我们还指望斯大林自己会考虑到列宁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他还就此做过保证。应该承认，对于斯大林的那些品质，我们许多人并不知晓。相反，他在会见一般中央委员和党的其他优秀工作者时，总是特别地平易近人，专心致志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毫没有“领袖派头”、任性和盛气凌人的表现。在和往常一样争论十分热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只发了两次言，其余时间都是默默地坐在主席台上，一次都没触动过主持人用的手铃。我想，不只我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对斯大林的举止给予了良好的评价。直到过了许多年，才终于弄懂，他所以做出那种谦和的姿态，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刚刚讨论过建议撤换他的《列宁遗嘱》。另外，摆出这种姿态是为了争取中央委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信任，以便进行一场他已考虑好了的、矛头指向政治局委员的斗争。这场斗争后来导致了对党的大规模镇压。

——不消说，我当时受到列宁那封信的强大感染，我（其实何止

我一个人呀！)心里由于没能听从列宁的建议而感到十分沉重。只有一个事实可以用来聊以自慰，那就是：列宁口述那封信后，斯大林为把列宁的干部统一在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周围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党在同托洛茨基进行一场斗争之后保持了一致和团结。要知道，托洛茨基在当时被认为是主要的危险啊。

谈到自己，我可以说，我认识“两个斯大林”：一个大致是在头十年，我对他这位老同志十分爱戴和尊敬；另一个是在以后的时期。在20年代，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会犯罪，而且犯那么大的罪！当然，我们在地方上也猜到政治局内有斗争，但是认为中央总会控制住总的形势，维护住党内的列宁主义民主。我们作为普通的中央委员是把这一点看做自己的任务的。

慢慢才清楚：要想完全保持列宁在世时那种平衡状态，越来越困难了。但是我们从没想到会把什么人从党的领导层“砍掉”。不同意见之争本来是正常现象，可是斯大林把这场斗争的真实目的包藏得很紧。甚至已经开始的“砍掉”活动，他也说成是划清界限不可避免，列宁去世后还要在政治局内部保持原状是不可能的。有时（最后一次是1926年），他还下最后通牒：要么问题按照有利于他的方式解决，要么他辞职不干……这种最后通牒常常是以间接方式提出的，但必定在大多数中央委员觉得他一走，倾向于“独裁”的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势力就会可怕地加强，进而引起分裂的时候。至于斯大林本人的独裁能量和行为，我是直到同它们斗争已经不可能时才充分认识到的。我同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十分接近，了解他们的心情。我想，他们同样被斯大林的“第一副”面孔蒙蔽了。比如1934年冬天，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基洛夫得票最多，一部分代表建议他作总书记，基洛夫竟然拒绝了。这就表现了这位极其光明磊落的人所具有的忠实品质和原则性。他把一切都告诉给斯大林了，但是得到的却是后者对整个大会，当然还有基洛夫本人的敌意和报复心。

这一点，我是20多年以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死后，老布尔什维克斯涅戈夫和莎图诺夫斯卡娅从流放地归来。我和斯涅戈夫是20年代认识的。和莎图诺夫斯卡娅结识于1918年，当时她在巴库作斯杰潘·邵武勉的秘书。赫鲁晓夫也很早就与他们相识。他们对我 and 赫鲁晓夫讲了许多我不大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的事情。莎图诺夫斯卡娅后来曾在党的监察委员会工作。监委在调查基洛夫遇刺案时，已根据文件确定，十七大上反对他的只有3票，反对斯大林的票数几乎比这多出100倍。当时，监票委员会主任札顿斯基和大会主席团指派负责监票委员会工作的卡冈诺维奇曾把这个情况秘密地报告给斯大林。斯大林要求把反对他的票数也压缩到3张。计票分13个委员会进行。我有个教会中学时期的老朋友安得列阿斯扬，是其中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据他说，仅他那个委员会就发现27票反对斯大林。被监禁了18年幸存下来的维尔霍维赫是当时大监票委员会的成员。就这样，事情渐渐清楚了：第一，基洛夫成了斯大林眼里的对手；第二、在党内，包括党的领导层中，虽说所有的反对派都垮了，但是对斯大林的不满仍然在潜滋暗长。这些情况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斯大林最初对基洛夫还是不错的。可是后来发生一些事，这些事只能解释为有意“整治”基洛夫。斯大林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更愿意依靠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然后是日丹诺夫，更晚些则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为人不坏，但是极其优柔寡断，有时就成为一些阴谋家，首先是斯大林本人手中搞见不得的勾当的工具。

谈到基洛夫，我不能不想到《真理报》上一篇署名“佐里奇”的小品文。说的是一位负责干部从巴库迁到列宁格勒，住进一套大房子，并在里面养了两只狗。纯属恶意蛊惑！可是叫人不舒服，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指的是谁。要知道，没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梅赫利斯是不会刊登这种东西的。还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他竟然组织大家讨论起基洛夫1913年一篇文章的句子如何“不通”

来了！

回过头来看十三大，我要说，不幸的是直到斯大林活动的后一个时期，即20年代末，特别是从30年代起，才在原先没能预见的范围内看清了列宁在《遗嘱》中指出的斯大林那些反面特征——而且何止只有那样一些啊！这就是我们不执行列宁遗嘱招来的可怕而又可悲的报应。

## 红场上

代表大会的首次会议开过后，我们大家来到红场上的列宁墓旁。那里正在举行隆重的少先队分列式。他们是来祝贺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

大会代表在列宁墓的两旁站好，主席团成员登上墓顶。列宁墓当时还是个木头塔的临时性建筑，它是后来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红场上1万多名少先队员排列整齐。孩子们，火红的领巾和花朵汇成无际的海洋。当主持分列式的共青团中央主席瓦秀廷宣布少年先锋队组织从今以后将用伟大列宁的名字命名时，我们大家都十分激动。

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几位成员致了祝辞，著名的德国女共产党员克拉拉·蔡特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然后是国际工人运动最老的参加者之一，德高望众的弗里克斯·科恩讲话。他一头蓬松的白发、白色的连鬓胡子、浓密的眉毛和一对聪明的、年轻人一般炯炯有神的眼睛，俨然是一个古代的贤哲。

他对少先队员们说：“我作为长辈，受命领导你们大家庄严宣誓”。

他开始宣读誓词，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少先队员们齐声重复着。

“时刻准备着”的声浪在红场上荡漾着。

那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刻。分列式结束后，大会代表步入墓

空，默默地绕过水晶棺。

## 党的任务

斯大林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组织工作报告相当紧凑。报告以具体事实为基础，事实阐述得心平气和，不带任何争辩色彩。报告对联系党和劳动人民的群众组织的状况做了分析。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都做了长篇报告。会上广泛地探讨了如何做好为纪念列宁而征集的共产党员的工作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囊括了当时我党工作的一切基本问题。那时，我们认为应该怎样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党的工人核心，怎样活跃党的工作和扩大党内民主呢？我们认为，要把年轻党员吸收到党和苏维埃的实际工作中来，把他们同国家、党、工会、合作社和其他机构的日常工作联系起来，正确组织他们的马列主义学习和文化学习。

托洛茨基在谈到自己的政治错误时，引用了一个有名的英国成谚：“对，还是不对，这总归是我的国家”，并且和经常一样用一句好听的、容易引起效果的话结束了自己的发言，他说：“……如果党做出的决定，我们中间某个人认为不公正，他会说：公正，还是不公正，这总归是我的党，因此我要把党的决定的后果承受到底”。

大会许多代表（托洛茨基讲话之后，就反对派问题发言的有鲁祖塔克、恰普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及其他一些代表）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立场。

大会齐声鼓掌，一致赞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活动。

## 合作经营，商业，农村

商业、合作经营问题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我国农村的种种问

题，在大会工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报告人和代表谈到商业问题时的出发点，是列宁有关在一定条件下“商业是几千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的各项指示。据代表大会上指出，私人资本在当时全国零售商品周转中还占统治地位：1922—1923经济年度为93.4%。在整个批发零售商业中，私人资本和国家合作社资本的对比要好些：大致是一半对一半。单在批发作业中，国家与合作社占到85.5%，私人资本只占14.5%。当时的任务是占领巨大的农民市场并逐渐挤掉私人资本。于是，发展国营商业和巩固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经营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大会指出：“农村合作经营的薄弱是无产阶级工业同农民衔接点上薄弱的一环”。

加里宁在做农村工作报告时，和往常一样，十分生动易懂地讲了农村形势和党在这一领域的政策。谈到农村阶级斗争状况时，他特别强调指出，农村党员在同富农进行斗争时，常常把稍富裕一些的中农划到富农方面去，这也使农村的阶级斗争更加复杂了。

为此，加里宁引述了列宁有关党应如何对待中农的多次讲话——“我们要同他们和平相处”。同时，他令人信服地指明，同富农做斗争，首先要在农村全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营。

在加里宁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作为他的共同发言人讲了话。她着重谈了农村学校教育的状况和在农村组织政治启蒙教育的问题。她谈到农村学校和阅览室的破落景象，农村教师沉重的物质生活状况，农村学校缺少铅笔、笔记本、教科书等情况。

当天向我们宣布，红场上集聚了数万名“老师”，他们是主动来向我们党表示忠心和爱戴的。他们还向大会派了代表团。季诺维也夫以大会的名义在红场上向他们表示致意。

代表们离开莫斯科，返回各自的工作地点，他们觉得十三大开得心齐，标志着党的团结。我们边疆区在罗斯托夫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我在会上报告代表大会的成果时说：这次大会明



显地证实了党有能力顺利地实现列宁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遗嘱。

## 灾年的困苦

1924年春天，我的肺结核病犯了，这一次比前一年春天更厉害。我瘦了，浑身没劲儿。当时的样子显然是病恹恹的，因为后来，7月初，我去莫斯科办事，斯大林和其他一些中央同志都看出来。

医疗小组认为我的身体状况严重，要求我长期治疗，不能少于3—4个月。可是，我没有马上去病休，因为当时已经可以看出，我们边疆区的许多地方将出现大欠收。塞瓦斯托波尔、捷列克、萨利斯克、莫罗佐夫斯克等地区以及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和印古什自治州的一些地方，那年几乎没有下雨。庄稼枯了，许多村庄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

有的农民为了保全牲畜，把他们赶到库班去，因为那里水草情况好些。许多人则在本地把牲畜宰掉，到市场卖肉。结果使这些地方的牲畜存栏数急剧减少。

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克服干旱造成的严重后果。经与边疆区党委会商量，我的休假日期推迟了一个月，等到采取了最紧急的抗灾措施再说。

遭到旱灾发生欠收的地方要求救济。我们本以为到收割以后可以让收成好的地区（库班、顿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来救济这些地方，可是灾区须要马上赈济，因为当地的投机分子和富农们用干旱一下子把粮价哄抬起来。因此，我们决定动员一批存粮，紧急运往灾区，首先把那儿的粮价压下去。

这个目标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但是，要保障下一年边疆区有个好收成，种植面积不缩小，则须要向农户提供种子。

经边疆区委员会决定，我紧急前往莫斯科，向中央委员会和